

反击天津便衣队暴乱

解方*

我于1927年初被张学良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，在日本先补习日语。在到日本军队入伍之前，张学良调我们回国在东北军入伍过士兵生活，这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张学良。当时他在保定指挥东北军与北伐军作战，正在围困固守涿州的傅作义。他对我们训话，表示信任我们，鼓励我们体验军队生活，到日本好好学习点高明的学问，回国来致力改革东北军，为东北集团效劳。他这个时期是遵守他父亲张作霖的意志办事，准备继承张作霖大元帅“宝座”的。

1928年冬，士官学校放寒假，我回到沈阳正赶上张学良接受国民党政府任命就东北边防长官之职，同时东北摘下了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，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，改变了张作霖时代的亲日政策，实行依靠国民党政府拥护全国统一的政策。这是由于张作霖于1928年6月初，未接受日本要求他固守北京由日寇出兵对抗北伐军的意旨，竟然退出关外放弃了北京。日寇想要“换马”，在皇姑屯车站把张作霖炸死。张学良继承其父事业后，幻想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同日寇较量，把日寇从东北赶出去，以报父仇救国难。这一政策当然要遭到日寇和东北的亲日派杨宇霆、常荫槐的反对，他们勾结日寇密谋推翻张学良并取而代之，哪知道却被张学良不动声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

* 吉林省东丰县人，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，1984年4月9日病逝。

铲除了。张学良从此巩固了他对东北的统治，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，可以说这是张学良在政治斗争上初露头角。

1930年冬，我们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。这时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拉拢亲率东北的30万大军入关，阎锡山、冯玉祥在北平召开的以反蒋为目的的国民党扩大会议被冲垮了，这是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又一次大力支持，张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兼北平军分会委员长，掌握华北、东北的军政大权。军分会会址本来设在北平，张学良却住在天津法租界的公馆里。因为我和孙铭久是他的弟弟张学铭的同学，又是他亲自保送去日本留学的，刚刚毕业回国，他亲自接见我们并一起共进午餐。张问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情况。这个时期，正是张学良在东北集团内部消灭了政敌杨宇霆、常荫槐之后，统治地位十分巩固；蒋介石对他拉得也很紧，东北集团的势力扩展到掌握华北的军政大权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，可说在军事政治权力上，是张学良一生中的顶峰时期。午餐结束后，张说，张学铭想留你们协助他整顿一下天津的保安总队，它是辛丑条约规定的变相的军队，你们学的军事还是有用的，跟着张学铭好好干吧。这就是张学良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的政治思想状态。果然在8个月之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就大举侵华首先发动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事变发生时，蒋介石电令张学良：“绝对不抵抗”、“一切听从国际联盟”。张在事变发生之后，把蒋介石命令照发给在关内的东北军队和政府，没有预计日寇还会继续扩大侵略范围，当然谈不上要求在关里的东北军应提高警惕严加防范了。果然在1931年11月初，日寇又发动的“天津事变”。这一天恰是张学良三弟在英租界举行婚礼的日子，日寇选在这一天发动事变当然不是偶合。我们事先得到日寇天津驻军即将在日本租界组织便衣队，依托租界在日军支援下向我进

犯的情报，我和贾陶、孙铭久等人没去参加张学良弟弟的婚礼。我们一方面建议采取紧急措施组织抵抗，同时特意向日租界提出照会要求逮捕引渡便衣队头目李际春、张璧等。明知日寇不会逮捕，这是有计划地“打草惊蛇”，迫使日寇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仓促发动，便于我主动集中兵力粉碎之；另一方面出乎敌寇意料之外，我们突然于当日下午5时宣布戒严，断绝交通，打乱了日寇企图把大部分便衣队，事先潜入市区里应外合的部署。日寇发动的“天津事变”被粉碎了，这是日寇在“九·一八”后，在关里遇到的首次抵抗。我们俘虏了便衣队重要首领，张学铭派我押送北平亲自向张学良汇报“天津事变”的情况并请求指示。上午七八点钟了，张还躺在床上未穿上衣服，听我汇报后只说了两句话：“知道了，把便衣队头子交军法处。”说完又闭上了眼睛，对于日寇以后还会采取什么行动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根本没讲。日寇在天津直接使用武力达不到目的，就通过驻华大使向蒋介石抗议要求撤换抵抗“天津事变”的官员。蒋介石又一次向张学良施加压力。张学良又一次执行了蒋的指示，暗中授意张学铭辞去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的职务，委派了亲日派周龙光、王一民接替。我和贾陶、孙铭久、于毅夫等也愤然辞职。

（摘自《西安事变资料》第二辑；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）